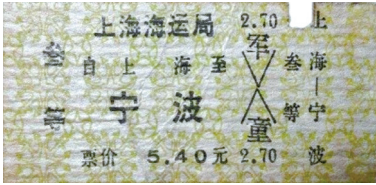


热闹了一百多年的江北岸轮船码头



上海-宁波的船票。

舒云亮/文

40 岁以上的宁波人都知道，现在的老外滩江边曾经是热闹的轮船码头，可以由此乘坐轮船去上海和浙江沿海各地。

1844 年 1 月 1 日，宁波正式开埠，江北岸甬江边开始设立洋行、修筑马路和建造码头仓库。在此之前，上海已经于 1843 年 11 月 17 日开埠，而且开发规模更大、速度更快，吸引了宁波许多商人去那里发展，还有更多的宁波城乡年轻人去那里当学徒做生意。甬沪两地的人员来往陡然增加，当然，那时候他们出行是搭乘帆船的。

1862 年，美商旗昌洋行的“舟山”号轮船从上海出发靠泊宁波外滩码头。宁波与上海之间的甬申线海运进入了快速、安全和乘坐舒适的轮船时代。

紧接着，英国太古洋行也开始在外滩修筑码头，加入甬申航线的轮船客货运输，其主力客船是“北京”和“新北京”轮，因此太古码头也叫“北京码头”。1874 年，官办民营的轮船招商局在太古码头北侧修建了招商码头，参与甬申线的营运，并在 1877 年收购了经营管理不善的旗昌轮船公司。

1908 年，民营的宁绍轮船公司成立后，即在太古码头南侧修建了宁绍码头，先后投入“宁绍”“甬兴”和“新宁绍”轮，也加入甬申线旅客运输的竞争。

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，江北岸的甬江外滩由北往南，从白沙到新江桥，密密麻麻排满了码头，主营客运，兼顾货运。太古、招商和宁绍是三家主力船公司，也是客流量最大的甬申线的主要承运人。其他船公司也在外滩修建了各自的码头，如永宁、宁兴、宝华、宁海和永川等，经营宁波城区至镇海、舟山各地、石浦、海门和温州等港口的客货运输。江北岸轮船码头呈现一派繁荣景象。

抗战胜利后，轮船招商局接管了日本人留下的几艘客货轮船，分别更名为“江亚”“江静”“江宁”和“江泰”等，雄心勃勃地想在甬申线客运



停泊在宁波江北岸码头的“舟山”轮。

中重振雄风。1946 年，“江亚”和“江静”轮在上海和宁波实行两地对开。

“江亚”轮于 1946 年 5 月首航抵达宁波时，甬上各界人士前往江北岸码头欢迎并合影留念，风光无限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两年后的 1948 年 12 月 3 日夜晚，“江亚”轮驶出吴淞口后不久在里铜沙水域爆炸沉没，罹难者 2300 人左右，大多是宁波城乡的旅客。这是震惊甬沪两地的特大海难事件，其惨烈程度和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 1912 年的“泰坦尼克”号。如今摆放在庆安会馆内的“江亚”轮船舵盘，似乎在提醒人们当年发生过的灾难。

1949 年春天，“江静”轮去了台湾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轮船招商局先后安排“江宁”和“江平”接替“江亚”和“江静”轮，继续甬申线的客运业务。

二

新中国成立后，江北岸轮船码头由宁波港务局经营管理。宁波港在这里成立了装卸作业区和客运站，原来船公司的专用码头成了公用码头，名字也分别改为车站路码头、扬善路码头和二横街码头等。宁波与省内沿海和舟山各地的海上客运由省市地方船公司承担。太古轮船公司退出了中国航运市场，宁绍轮船公司转向长江内河航运。轮船招商局重组后更名为上海海运管理局，

甬申线的海上客运业务由其独家经营，改变了原先的多家竞争局面。在这条航线上，海运局安排两艘客轮对开，每天傍晚分别由上海和宁波开航。“民主三号”是航线上的固定客轮，与之搭班的是“民主十四号”“民主十八号”或“民主十九号”等海轮。

宁波人喜欢把“民主三号”叫作“民三轮船”。这艘客船也发生过海难事故。1955 年 4 月 16 日下午 4 点，“民三轮船”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开航驶向宁波。夜里海上起了雾，第二天凌晨 3 点，客轮在镇海口外不慎触礁，海水汹涌灌入舱内。但经船上军民合力自救和过往船只以及驻宁波部队“英雄 37”号舰艇的奋力救助，船上 1308 名旅客和船员全部获救，创造了中国海难史上的救援奇迹。后来“民三轮船”被打捞上来，经全面整修后，继续参与甬申线的旅客运输。

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，有一天人们发现抵达江北岸轮船码头的“民主三号”变成了“工农兵 3”。“民主十八号”和“民主十九号”也相应地改为“工农兵 18”和“工农兵 19”。但甬申线客轮不管怎么改名，在宁波人的眼里，都是“上海轮船”。

20 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江北岸轮船码头很是热闹。车站路码头停泊的是上海轮船，扬善路码头则停靠了甬温线的本地客船“浙江 604”或甬定线的“浙江 601”轮。由于船多码头少，许多船只



1900 年前后的太古码头。（均为资料照片）

停靠在其他船舶的外面。最热闹的当然是上海轮船码头，早上每当客轮汽笛鸣响，江北岸的居民就知道上海轮船靠码头了。客运站候船室里满是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等待上船的旅客，售票处内外挤满了排队买票和等待退票的人，还有“黄牛”在附近徘徊搭讪。轮船到港放客的时候，码头的车站路出口处人潮汹涌。

1980 年前后，宏伟壮观的宁波港客运站大楼拔地而起，彻底改变了百年来江北岸轮船码头客运设施简陋和破旧的面貌。那个时候，在甬申线上跑了近 30 年的超龄客船“工农兵 3”退出了营运，“工农兵 18”和“工农兵 19”又改名了，这次改成了“庆新”和“贺新”。上海海运管理局还相继在这条航线上安排“繁新”和“荣新”等新船轮流停靠宁波。

1985 年，上海海运局在甬申线增加两艘海船，这样宁波、上海两地每天都有两班客轮开航。后来宁波海运公司的“天封”轮也投入甬申线客运。上海轮船一票难求的问题得到很大的缓解。

此后几年是江北岸轮船码头的高光时刻。根据上海海运管理局统计，1991 年甬申线旅客运输量为 155 万人次，是峰值的年份。

三

1998 年底，随着沪杭甬高速公路的通车，铁路、公路、水路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“棉区”“稻区”应是计划经济年代之称呼。在我们宁波，过去“棉区”在沿海平原一带，如慈溪、余姚、镇海等县的北部。1954 年因植棉而划建的慈溪县是典型棉区，被誉为“浙江棉仓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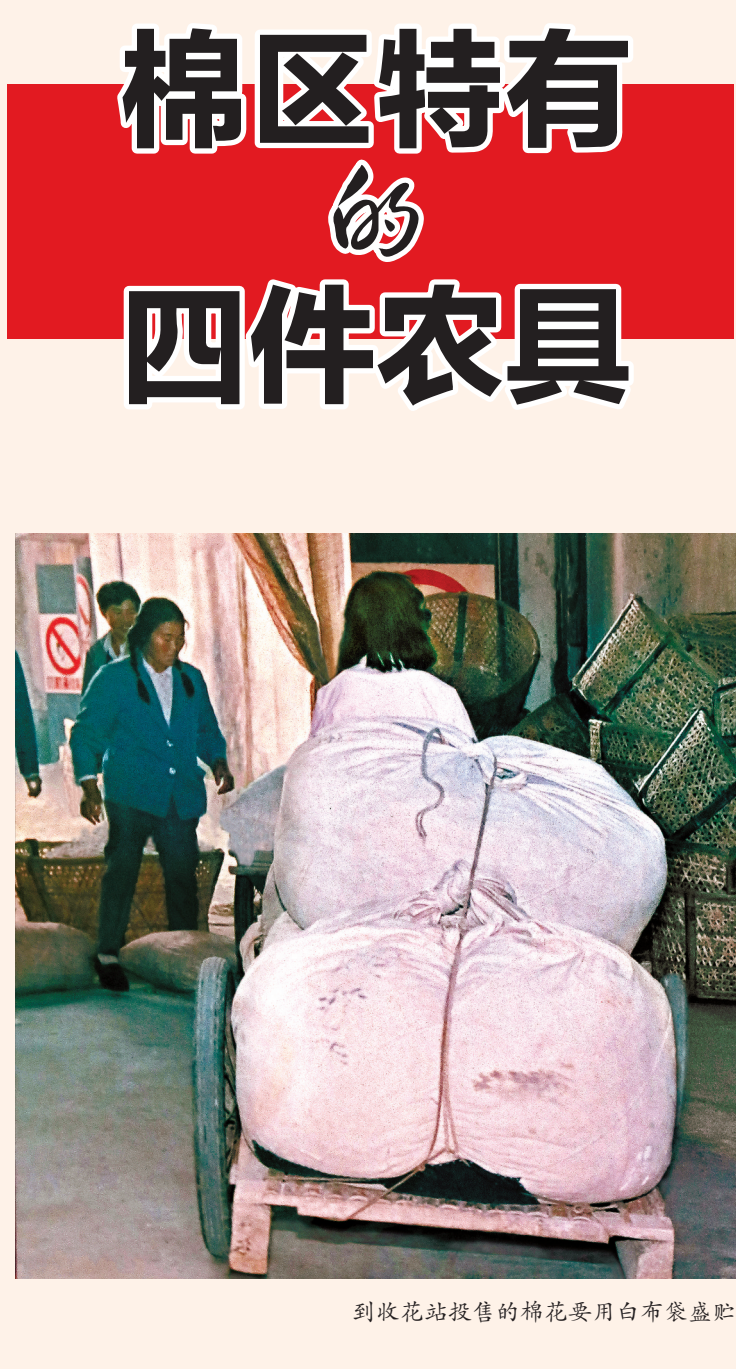
棉区与稻区所使用的农具，部分是通用的，如喷雾器、铁耙等，但有些是不同的。我把棉区农具分成两类：一是集体备置的，一个“小队”仅需一两件的大型农具，如农船、脱粒机、“长篮”等。二是家庭备置的手工农具，宁波人称其为“用手家生”。

农具的样式真多，所谓“一种生活（活儿），一种家生（用具）”。在整个“小队”里，手工农具能配备齐全的家庭很少，不齐全咋办？一是借用，二是派他干其他的活。但常用的农具是人手必备的，不能老是借用或“因缺器而废活”。

早年的慈溪县五洞闸公社是全国农业先进典型，是“浙江棉仓”的高产区，我曾去那里支农 10 年，受益匪浅。我在“小队”担任过记工员，对何种农活要使用何种农具，烂熟于心。下面的四件农具，对我这个“白脚脱（杆）”农民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，说明它们在棉区的使用具有普遍性。

第一种是播种、移栽棉苗用的农具，名为“打孔器”，或称“制钵机”“移栽器”。五洞闸农民称其为“钵套筒”或“营养钵筒”。其下部是如钵的铁皮筒体，把棉苗套入筒体后，上部的横杆用力下压，把整个筒体插入土内，之后再拉出筒体，这样棉苗及其四周的泥土被“钵套筒”套出了地面，便可进行移栽。另一做法是，先在田里理出一片营养土，将营养土套制成一个个圆柱体的泥钵，再在泥钵中间种入棉籽，待出苗后再移栽。

这种打孔器不属于传统农具，大约在 50 年前流行并使用，它实用方便，有利于棉苗早发好长。它与传统移栽农具“花揪”相比，效率不可同日而语，且确保了移栽的成活率和棉苗的后发优势。“苗不等人”“苗好三分收”，播种后，保苗、移苗、护苗



到收花站投售的棉花要用白布袋盛贮。

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，打孔器在棉区有着广泛的用武之地。

“阿伟啊，钵套筒你也要去买一个的。”小队长说。于是我很快速办上了，当然不买的知青也有。“钵套筒”是固定资产，可以用上好多年。我置办它，也显示了我当年抱有“扎根农村一辈子”的信念。

5 年前，我又一次回到“第二故乡”五洞闸，在农户家中寻到了“钵套筒”，大家回忆往事感慨

颇多。记得那时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，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“棉花姑娘”的慈溪县委书记黄建英，为慈溪在全国棉区树立标志办上了，当然不买的知青也有。不遗余力推广新型农具。

第二种是盛贮棉花的白布袋。白布袋是用白布缝制的特大布囊，都是农家自织自缝的。棉区虽吃不到好米，但织布用好棉，被褥有软絮，他们的白布袋织得很“板扎”，盛贮棉花后，即便任意踩踏，白布袋也安然无恙。



“钵套筒”，左上角是它套出的泥钵。



拔棉花秆的花钩。



长扁担虽一年用了没几次，可它给我留有深刻印象。

采棉时节，每位棉农下地都带着白布袋，当几个白布袋装满后，就两袋成一担地挑向农船，直至船上堆满白白胖胖的布袋为止，这才是棉农最喜悦的时候。这时农民们常说：天天担着饭篮出门，终于换来了一个个胖满的白布袋进门。

白布袋是收棉的流转工具，直到棉花投售到收花站，白布袋的一次流转才算完成。白布袋流转得越忙活，农民越高兴。白布

袋用后可折叠起来，占用空间比箩筐小得多。白布袋的袋口有长而结实的系绳，没有扁担时也可搭在肩上扛走，简单方便。我想它一定是勤劳聪明的棉妇们创造出来的。

白布袋在供销社无售。那时我光棍一条，有谁给我织缝白布袋呢？农民们说：不要紧，我们借你吧，一户人家总有几个白布袋的。

第三种农具叫“花钩”，它是“了”字形的铁钩子，用于拔棉花

秆。棉花采收完后，得把大畈大畈的棉秆拔去，越快越好。因为三北棉区当时流行套种，此时棉秆下面套种的蚕豆苗已长到 1 寸多长了，棉秆不拔去，就会影响蚕豆苗的生长。

拔棉秆是棉区最苦的活，尽管有了拔棉秆的钩子，效率大大提高，但起早贪黑两天下来，双手全是血泡。站着欲坐下，双腿屈膝时酸痛异常。坐着欲站起时，又是一阵酸痛。女知青们痛得哇哇直叫。

虽然花钩柄部包扎着软布，知青们还从城里带来手套，但血泡“照起不误”。到了第三天，“泡上起泡”，疼痛更难忍。这样的拔棉秆活儿要持续五六天。

五洞闸的棉花长势很好，棉秆高过头顶是常见的。有时一株棉秆需要两三人同拔。此时我才体会到，棉花刚引入中国时为何被称为“木棉”。

3 年前，我去现今五洞闸村创办的棉花博物馆参观，看到一柄花钩，不由得百感交集。似觉手心仍有痛感，铁钩裹布上似乎还有血丝。

第四种农具是长扁担。扁担是农业社会中常见的农具，但将近 3 米的扁担能有几人见过。棉秆拔完后，要赶紧挑走，一是为清理棉田，二是棉秆乃农家不可或缺的柴火。这时长扁担就派上用场了，因为棉秆很长，而一担棉秆中间要容得下一个挑担人转身，如果用普通扁担，中间就留不出站人的空间了，得用长扁担。

一担棉秆约莫 150 斤，不算很重，但挑着它顶着海风翻越海塘，却是考验。挑棉秆大多在 11 月下旬，此时秋风已盛，一担棉秆体积大，“吃风”不小。当时我村的棉田多在北海塘到南海塘之间，南边的海塘虽不直接御海，却作为备塘保留着，不得挖口子通船。故棉秆必得担到南海塘南坡前河边下船。

荷担顶风翻塘是最费劳力的，农民说，这是“一脚不来、一脚不去”的时刻，拼命也要撑上去，否则滚下塘去得第二次冲顶。翻塘后返回住所，才发现自己的肩头已被长扁担磨破了，衬衣、皮肉糊在一起。当时即将成人的我“骺力”已经有了，“杀性”也不小，但肩皮到底还嫩了些。

长扁担虽然一年用不了几次，可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